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研究成果
浙江行政学院学科建设成果资助项目

信用政府的逻辑

——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现象的制度分析

何显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用政府的逻辑：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现象的
制度分析 / 何显明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730-277-3

I. 信... II. 何... III. 地方政府—信用—研究—
中国 IV. D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4179 号

信用政府的逻辑

——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现象的制度分析



作 者——何显明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2.375

字 数——34 万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 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277-3/D·11

定 价——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社会信用体系的生成机制.....	1
一、信用的内涵	1
二、信用的社会功能	9
1. 信用与信任是人类合作秩序的基石	9
2. 信用是市场机制的润滑剂	11
3. 信用是文明进步的助推器	16
三、信用的生成机制	19
四、信用结构转型中的信用危机	26
1. 中国传统社会信用结构及其缺陷	27
2. 社会信用结构转型的困顿	36
3. 体制转轨中的信用建设难题	40
第二章 政府信用的一般理论分析	44
一、政府信用的表现形式	44
二、政府信用的特殊规定	48
1. 政府地位的特殊性与政府信用关系的非对等性	49
2. 政府的非竞争性 with 政府信用关系的不可选择性	50
3. 政府信用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绝对性	53
4. 政府信用社会影响的广泛性	54
三、政府信用的政治寓意	56

四、政府失信的内在逻辑	62
1. 政府职能二重性的内在紧张	62
2. 政府行为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冲突	67
3. 政府的“委托代理问题”	75
4. 政府行为的内部性	79
5. 委托人集体行动的困境	82
五、政府信用危机的危害	85
1. 政府信用短缺与政府效能低下的循环	85
2. 政府信用短缺与社会低信用均衡	92
3. 政府信用短缺与政府合法性危机	94
第三章 角色错位：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体制根源	100
一、政府角色与政府信用的内在关联	101
二、角色缺位中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	110
1. 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113
2. 信用信息服务的提供	115
3. 社会公正秩序的建构与维护	116
4. 市场信用失灵的校正	118
三、角色越位中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	125
1. 对微观经济过程的深度介入	126
2. 难以遏制的行政干预冲动	132
3. 政府信用资源的滥用	135
4. 行政偏好的失控	140
第四章 能力局限：地方政府信用责任的困境	144
一、政府能力与政府信用的内在关联	144
二、全能型政府遭遇的信用能力限制	150
三、信用能力与信用责任的不对称	160
1. 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	163

2. 低下的行政运作效率	167
3. 意识形态动员能力的弱化	173
4. 制度能力的短缺	176
第五章 利益驱动：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内在动因	183
一、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自利性的凸现	183
二、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与政府信用问题	188
三、部门利益与政府信用问题	198
四、政府官员的自利性与政府信用问题	209
第六章 逆向激励：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发生机制	219
一、政府体系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	219
二、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空间的扩展	224
三、政府行为市场化与地方政府信用问题	231
四、政治晋升博弈中的地方政府信用问题	245
第七章 行为短期化：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内在逻辑	258
一、公共政策与政府信用	258
二、制度安排与政策行为导向	268
1. 压力型体制与政策功能导向的扭曲	268
2. 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	274
3. 政治动员机制与政策稳定性问题	278
三、行为短期化中的政策信用问题	280
1. 政策主体偏好与政策功能的单一化	281
2. 短期政绩最大化与政策行为仪式化	286
3. 短期政绩最大化与政策连续性的缺失	290
4. 政策利益非均衡与政策公正性的缺失	297
第八章 信用政府的政治逻辑	303
一、理性政府：政府形象的重构	303
二、有限政府：政府信用责任范围的合理界定	313

三、法治政府：政府信用的非人格化	318
四、民主政府：政府信用约束机制的建构	327
五、责任政府：政府信用责任的明晰化	333
第九章 信用政府的行政逻辑	338
一、完善政府官员信用责任机制	338
1. 强化政府官员履行信用责任的压力机制	338
2. 完善政府组织内部的信用责任机制	342
3. 将信用责任履行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指标体系	347
二、强化政府信用行为的监督机制	349
三、优化地方公共政策过程	353
1. 健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357
2. 推行政策制订过程的公开化,增强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	360
3. 健全公共政策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政策实施反馈机制	362
四、健全政府行为的财政刚性约束机制	364
五、完善政府失信的国家赔偿制度	368
参考文献	373

引 言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几乎东西方各国的政府都遭遇了一个吊诡性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规模不可遏止地迅速膨胀,政府的行为边界被不断突破,以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被打上了醒目的政府烙印,普通百姓已经越来越难以想象不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日常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甚至是否可能;另一方面,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政府有史以来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地遭遇信任危机,在公众的心目中,政府的形象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以致撇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负责任、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这些词汇,似乎就无法真切地描绘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形象。

信用缺失、信誉危机已经成为东西方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近 20 个多元化民主国家里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相当一部分,有的甚至是大部分公众,对党派、政府、议会、高层行政机构、法院、军队、警察、工会、大公司、教会、电视和其他大众传媒等主要机构和组织“完全不信任”或“不太信任”。^①在美国 40 年来的调查显示,对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的居民广泛地分布在各个阶层。20 世纪 60 年代,85% 的美国人把他们政治机构的运行当成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30 年之后的 1995 年 7 月,分别具有民主党和共和党背景的两大组织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却表明:93% 的美国人谴责政府挥霍纳税人的钱,88% 的人批评大选前乱开空头支票的现象。可以说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二

^① 参见欧阳向旭:《发达民主国家的信任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 年第 3 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内容请访问: www.ezreading.com

三十年间,美国公民对政府及美国政治制度的态度几乎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1988年,只有16%的美国人对联联邦政府表示很信任,而在1966年这个数字却是43%;同时,对国会、最高法院、军队表示很信任的美国人的比例也分别从42%、50%、61%下降到15%、32%和33%。^①

更让美国政府感到忧虑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已经由成年人传递给了他们的子女。1962年至1973年期间,认为公职候选人的“自私比任何人都少(或比大多数人少)”的五年级学生的比例,从54%下降到了20%;认为公职候选人比较诚实的人的比例,从59%下降到了30%。^②

公共管理学家格罗斯·斯塔林写道:“让人感到不安的是,长期以来,公众对美国政府信任度的下降,不仅表明了人们对政府权威的怀疑,同时更表现出对政府官员所作所为的嘲讽。在1965年被问及‘你认为华盛顿政府有多少时间在做应该做的事情’时,61%的美国人回答说‘全部时间’或‘大部分时间’,只有36%回答‘一些时间’或‘根本没有’。而到了1988年,调查结果却正好相反。只有33%的人回答说‘全部时间’或‘大多数时间’,而有65%的却回答说‘一些时间’或‘一概没有’。”^③

公众对政府幻想的破灭,原因是多方面的。利普塞特和施耐德在《信心的鸿沟》揭示了政府信任危机的四大根源,即政府工作不佳、越战、水门事件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似乎只触及到了一些表层的问题。凯尔曼则将政府信用危机问题同政府职能的扩张联系起来,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增强,在人民的生活中,政府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由于重要性的增加,对已论述过的挫折和怨恨的一切起因的认识也增强了”^④。换言之,人们对政府的失望与他们对

① 参见欧阳向旭:《发达民主国家的信任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3期。

② 史蒂文·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页。

③ 格罗斯·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④ 史蒂文·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51页。

政府过高过多的期望有关。相形之下,其他一些学者的分析更为尖锐。如马修(David Mathews)就将政府信任危机归咎于公众普遍的无力感,即美国人感到他们“被职业的游说者、专职政客、竞选活动的管理者和媒体的精英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①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政府信用危机就意味着政府的决策体系、政府的运作机制及组织政府的政治程序存在重大弊端。

并不是只有美国政府才遭遇了令人头痛的信用危机问题。在欧洲,1979年英国公民对政府管理表示满意的人只占35%,不满意的高达54%。^②在意大利,1987年只有26%的人对现行制度表示满意。1973年至1991年期间进行的25次民意测验表明,每次总有超过70%以上的意大利人对现行制度作出了否定性评价。^③

北欧国家是福利国家的典范,其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保障体系曾让人觉得政府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但这些国家的公民对政府并不领情。挪威奥斯陆工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妮·博格撰文写道:与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在过去10~15年间所经历的变化一样,挪威人现在对集体责任与公共服务已不再热心,而之以对个人解决问题能力与责任的推崇。199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5%的人表示了对公共行政的一般性信任。在瑞典进行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最缺乏信任的是新闻界(79%),其次是政客(74%)。在过去的40多年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有着巨大的落差。^④

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或者说政府普遍遭遇的信用危机,构成了80年代以来席卷欧美主要国家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运动的重要社会背景。这场打着“新公共管理”、“重塑政府”、“后官僚制行政”、“企业化政府”等各种旗帜的改革运动,极为鲜明地表现出了对政府本身的不信任

^①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② 左然:《当代国际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10期。

^③ 参见欧阳向旭:《发达民主国家的信任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3期。

^④ 安妮·博格:《通过规制实践建立责任与信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态度,其主旨就是要通过私有化改革,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打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管理界线,大胆地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塑造出职能有限而品质优良的政府。作为这场改革运动重要的理论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就对政府持有极为强烈的不信任态度,认为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想政府,政府行为的各种主体,包括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同市场主体一样,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官僚群体的利益总是被他们摆在比公共利益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考虑。政府行为的这种逻辑起点,既是政府规模日益膨胀,政府支出不断攀升的重要根源,也是滋生政府官员不负责任、营私舞弊等招致公众强烈反感的诸多现象的症结所在。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所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曾被誉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圣经。而就在这部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中,奥斯本和盖布勒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对政府的信任一再降到创纪录的最低点。”^①与此相联系,1993年,克林顿发起重塑美国政府运动,解决信任危机正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不仅面临着预算赤字和投资赤字,由于联邦政府的绩效赤字,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信任赤字。除非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他问题都无法谈起。”^②

作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延续,90年代以来,“治理”或“善治”成为西方国家有效公共管理模式探索实践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个概念。“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成为当前一些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改革的最新旗帜,“治理”理论也因此成为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思潮之一。治理的主要特征,概括地讲,意味着“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

^①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 转引自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市场原则的管理 ;不再是由国家‘指导’ ,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① 而所谓“善治”就是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伙伴性的合作关系 ,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衡量标准主要包括 :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有效、稳定、廉洁、公正等。^②

“治理”理论的兴起 ,固然有多重的社会历史背景 ,但从其强调政府并非惟一的权力中心 ,主张建立政府、民间组织及公民多元互动的治理结构的理论主旨不难看出 ,这一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改革试验 ,同样贯穿着一种对传统的政府权威的挑战意识 ,贯穿着对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 ,却难以有效地承担起责任的公共管理模式的不满。按照俞可平的分析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 ,从全社会的范围看 ,善治离不开政府 ,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 ,可以没有政府统治 ,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 ,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至多只有善政 ,而不会有善治。”^③ 因此 ,实现善治的过程 ,乃是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解构过程 ,是借助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 ,增强治理效能 ,重新树立政府权威和信用形象的过程。显而易见 ,提升政府信用 ,是从 80 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实践 ,到如今方兴未艾的“治理”理论一以贯之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如果说 ,西方国家的政府信用危机暴露的是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同工业化时代社会结构演变不相适应的问题 ,其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发达公民社会也为政府管理体制变革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基础 ,因而这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渐进式改革而得

^① 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理安 :《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 年第 2 期。

^{②③} 俞可平 :《引论 :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第 8 页。

到缓解的话,那么,转型国家面临的政府信用危机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治理问题,政府信用的社会背景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解体。由于既缺乏完善的法治秩序和市场秩序,又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转型国家面临的政府信用危机问题不仅暴露得更为尖锐,而且解决危机的前景也更加不明朗。

转型国家固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社会制度结构,既限制了横向的基于平等契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也免除了个体承担信用责任的义务。在长达数十年的封闭化的社会生活空间中,人们很少得到信守契约义务的社会生活训练。这些国家一旦启动震荡式改革,原有的社会控制机制突然失灵时,就会产生政府权威下降,法律秩序紊乱,社会行为失范,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各种乱象相互交织,恶性循环,社会信用体系几乎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由于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威,政府效能严重低下,且内部腐败不断加剧,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和耐心。正如科尔奈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制度体系的剧烈变迁进程中,几乎所有的转轨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公众“缺乏对国家的信任并感到不能依靠法律的力量”的现象。^①如俄罗斯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仅有2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把违约行为诉诸法律。^②政府无法有效地维护社会正义,保证社会契约得到严格执行,其结果必然是黑社会势力猖獗。转型国家在体制转轨过程经历的社会阵痛充分表明,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夜之间毁掉自己的信用,但要重新树立信用政府的形象,却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科尔奈写道:“诚实与信任——这两者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利益攸关、举足轻重,但是和其他情形下相比,它们在后社会转轨时期显得更为重要,研究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更为艰巨。”^③

信用危机无疑也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历程中社

^{①②③} 雅诺什·科尔奈:《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9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

会秩序所经历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哪一个社会生活领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信任和信用危机。产品制造领域层出不穷的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现象;生产经营活动中普遍性的偷税漏税问题;传销领域触目惊心的将人与人之间最核心的信任关系破坏殆尽的“杀熟”现象;体育竞技场上屡见不鲜的“黑哨”事件;教育领域的假文凭问题,等等。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几乎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坑人的陷阱,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世界:不知道还有什么食品是可以放心食用、没有注过水、施过剧毒农药,或不是在令人恶心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广告、宣传不是在骗人;不知道还有什么文件、证件、资格证书等等是不能伪造出来的;不知道哪个道貌岸然的官员背地里是不是五毒俱全的腐败分子……毫不夸张地说,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正面临着一场剧烈而深刻的危机。

政府信用是支撑社会信用体系最重要的力量。如果说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树立自身良好的信用形象,即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信用危机现象,借助于政府信用,以及政府作为中立而富有权威的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如为公众提供及时和充足的社会信用信息服务,严格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惩治失信违约行为等等,应当可以在相当程度缓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危机,逐渐恢复人们对社会生活秩序的信任。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转型期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许多部门同样发生了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政府职能转换严重滞后,政府角色错位,政府行为不规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司空见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等等,这一切都使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在市场失灵、社会信用体系发生严重危机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制止社会信用危机现象继续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而且其自身大量的公然失信行为,实际上起到了加剧社会信用危机的催化剂作用,构成了社会信用危机的重要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目前正遭遇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信用危机。

近几年社会信用危机的加剧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其后召开的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确定,要用五年的时间,建立起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其间,不少地方政府也纷纷打出了打造“信用××(省或市或县等)”的旗帜,并制订出台了相应的文件规定。

社会信用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形之下,政府自身的信用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被提到行政体制或政治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由于现阶段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基本上还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控制,在政府无法形成自身良好的信用形象,无法恢复公众对自己的信任的情况下,任何旨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是治标之策。

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政府信用直接关系到政府存在和运作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解决地方政府信用资源严重流失问题,不仅会导致政府运作成本的不断攀升,使行政体制改革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而且还将给整个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留下重大隐患。就此而言,能否在宪政体制的框架内,积极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在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基础上,塑造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政府,直接关系到中国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最终能否顺利实现。

应当看到,转型期的地方政府信用缺失问题,是一个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价值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体制转型和政府转型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行为调节问题。信用政府有其特定的政治逻辑和行政逻辑。塑造信用政府,不仅需要建立一系列规范政府信用行为的法律法规和专门制度,而且需要完成对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变革,需要重构整个行政

文化体系。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决不可能通过几项措施而轻易实现。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能够在二十年内,在民主政治和法治行政的框架内,按照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完成政府职能的调整,基本解决体制性的腐败现象,做到依法行政,切实有效地履行有限政府的职责,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真正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可的信用形象,那将是一个足以载入世界行政史册的了不起的历史成就。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政府信用建设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危机的社会历史背景,地方政府信用危机的内在逻辑,建设信用政府的政治前提与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等问题,都有待于深入具体的研究。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笔者是对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开展系统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全书在对社会信用与政府信用涉及的基本问题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社会历史背景,围绕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外在约束条件与内在动力机制的演变,着重就地方政府信用危机发生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并就建设信用政府的政治前提,以及信用政府建设涉及的相关制度建设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第一章 社会信用体系的生成机制

地方政府的信用缺失甚至信用危机问题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包括社会信用体系的结构性的变迁。政府信用既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维系和运作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要深刻理解政府信用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信用缺失的内在逻辑,首先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信用体系所具有的维系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合作秩序扩展的重要功能,以及社会信用生成与解体的内在机制与逻辑。

一、信用的内涵

一般来说,信用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信用特指商业信用或市场信用。马克思曾引用洛克的话说:“信用,在它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这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一定要偿还。”^①确切地讲,商业信用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反映了货币或商品的持有者以还本付息为条件,把货币或商品暂时转让给他人使用的债权债务关系。广义的信用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履行契约义务而取得的信任。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信用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2页。

任 ;二是不需要提供物资保证 ,可以按时偿付 ;三是指银行借贷或商业上的赊销、赊购。后两个含义属于商业信用范围 ,而前一个含义属于广义的信用范围。本书的信用概念均针对广义信用而言。

应当说 ,信用本身是个中性词 ,与其对应的褒义词是“守信”或“讲信用” ,贬义词则是“失信”或“不讲信用” 。守信、讲信用意味着行为主体严格履行同他人达成的约定、契约 ,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因此而取得他人的信任。失信、不讲信用意味着行为主体没有严格履行契约 ,有意无意地规避相应的责任 ,并因此而造成他人权益的受损。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在多层意义上指称信用。一是行为主体履行契约的主观诚意。对于那些不计个人利害 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的承诺或所承担的契约义务的人 人们往往会给予很高的道德评价 ,赞赏他“讲信用” 。二是行为主体所承担契约义务得以完全履行的结果 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行为主体履行契约义务的实际能力 即信用能力。穆勒曾经说过 :“究竟乙有多少信用 要看人们对他的偿付能力的评价。”^① 无论行为主体主观上的履约诚意有多大 只要他最终完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人们也会给予守信的评价。反过来 ,一个人即使有很大的履约诚意 如果最终却没有能力承担自己的信用责任 客观上同样会产生失信于人的后果。三是行为主体凭借其良好的信用诚意及其恪守信用的经历而获得他人的信任。这种意义上的信用往往与行为主体的道德信誉紧密相关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信用” 。概括地讲 ,信用概念有三个基本要素 即信用诚意、信用能力与信用评价。

与信用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概念无疑是信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信任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其间产生了一些经典之作 ,如卢曼(N. Luhmann)的《信任与权力》^②、巴伯(B. Barber)的《信任的逻辑与局限》^③、福山(Fukuyama)的《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④等

①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第 62 页。

② N. Luhmann ,Trust and Power. Chichester : John Wiley and Sons. 1979. 。

③ Barber ,B.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④ 福山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海南出版社 2001 年。